

宋紹英／著

日本崛起論

RIBEN JUE QI LUN

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



日本崛起论

宋绍英 著

●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日本崛起论

RIBEN JUEQI LUN

宋绍英 著

责任编辑：齐仁庆 封面设计：李冰彬 责任校对：黄殿华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110号)
(邮政编码：130024)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吉林农业大学印刷厂制版
吉林农业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1990年6月第1版

印张：13

1990年6月第1次印刷

字数：333 千

印数：0 001—1 500 册

ISBN 7-5602-0434-1/K·41 (压膜) 定价：6.50 元

前 言

这是一部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在严峻的经济、政治形势下迅速崛起的史论结合的论著。

全书共分七章。

绪章，是战后日本实现崛起的背景，结合战后日本经济的重建、改组和恢复的进程，论述日本在生产发展和生产关系变革的基础上，为经济的高速增长建造物质技术基础的政策和实践。

第一章到第五章，是本书的主体部分，结合战后日本经济崛起的史的轨迹，集中论述日本政府及垄断资本在充满矛盾的实践中为实现崛起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揭示这些政策措施的垄断资本的经济增长主义的实质及其双向效应，并探析促进日本迅速实现崛起的经济的、政治的、社会文化的诸多因素。

终章，是作为日本崛起后的走势，主要结合国际国内形势的新变化和日本经济的转折，论述日本作为国际化的“经济大国”和觊觎“政治大国”的国家所推行的战略措施，

并揭示其面临的内在的和外在的矛盾。

认识外国，借鉴外国，是外国问题研究的基本目的。认识和借鉴，贵在全面。本书作为史论结合的著作，在阐明战后日本崛起的史的过程，并对这一过程进行论述中，既注意坚持客观分析的原则，揭示其政策的正向效应和符合规律的成功方面，又注意坚持矛盾分析的方法，揭示其政策的内在矛盾、阶级实质及其反向效应。

由于水平所限，本书中论述不妥之处，诚恳希望读者不吝指正。

· 著 者

1990年4月

目 录

序言 (1)

绪章 战后日本经济的恢复与改组 跃进基础的建造 (10)

第一节 严酷的经济政治形势 (10)

第二节 战后的民主改革——生产关系的部分调整 (16)

第三节 抑制通货膨胀——经济秩序的整顿 (33)

第四节 从“倾斜生产方式”到经济复兴计划 (44)

第五节 从“特需”繁荣到经济全面恢复 (58)

第一章 日本经济起飞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 (66)

第一节 国际环境 (66)

第二节 国内形势 (73)

第二章 日本经济崛起的史的轨迹 (80)

第一节 经济跃进的起步和重化学工业化方针 (80)

第二节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和经济跃进的展开 (93)

第三节 经济跃进的新高潮和日本成为
“经济大国” (106)

第四节 国际国内形势的转变和经济跃进
时代的终结 (122)

第三章 经济增长政策论 (131)

第一节 经济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 (131)

第二节 双重结构下的中小企业政
策 (136)

第三节 经济增长主义的农业政策 (145)

第四节 对外经济贸易政策 (155)

第五节 技术战略 (171)

第六节 教育战略 (185)

第四章 日本经济增长主义得失论 (195)

第一节 经济增长主义及其双向效
应 (195)

第二节 经济增长主义之“得” (197)

第三节 经济增长主义之“失” (209)

第五章 日本经济崛起原因探析 (223)

第一节 社会物质文化基础条件 (223)

第二节 以技术革新为内容的设备
投资 (227)

第三节 技术进步与智力开发 (236)

第四节 有特色的宏观经济管理 (239)

第五节 人是决定性因素 (257)

终章 日本经济的转折与走势 (261)

第一节 石油危机与日本经济的转
折 (261)

附：访八丁原（272）

第二节 新技术革命与日本的战略（275）

第三节 “黑字大国”与经济结构
的调整（296）

第四节 日本经济的国际化（308）

附录：战后日本经济大事纪要（321）
（1945年—1989年）

序 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在遭到严重战争破坏，陷于瘫痪边缘的基础上，迅速恢复和发展，经过较短的时间，跃为资本主义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大国”，实现了经济的崛起。对这种令世人瞩目的“日本现象”进行研究，研究其历史的和现实的背景，阐明其规律性和政策性因素，揭示其客观和主观的矛盾，不仅有现实意义，而且有理论意义。

研究，需要科学的方法论。没有一个科学方法论的指导，就不可能有正确的认识。特别是面对战后日本这样的现代资本主义形态的复杂事物，更需要能够正确反映其客观现实的理论和方法，要作到这一点，是需要下一番功夫的。这主要是因为，战后日本作为一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其本质虽然没有根本改变，但在一些方面确实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呈现了一系列新特征，我们过去在这方面的某些观点也必须有所发展和调整，只有这样，才能够正确反映这些新变化。

—

众所周知，我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封建社会历史，长期处于闭关自守状态的国家，过去的统治阶级以大国自居，夜郎自大的思想对人们的影响很深。建国后一段时间，由于我国对外开放不够，人们对外国知之甚少，因而自觉不自觉地形成一种孤芳自赏

的排他性观念，认识外国、借鉴外国的问题未被置于应有的重要地位。历史上我国的一些有识之士也曾有过对外国的研究学习，但由于没有一个科学的方法，严格地说来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借鉴，也不可能学到有益于我国的外国先进经验。建国后50年代，虽曾广泛强调了向苏联学习，借鉴苏联，并且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应该说，那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政治环境中，对特定制度的外国的学习和借鉴。至于对资本主义国家经验的学习和借鉴，则讳莫如深。特别是由于当时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制度、政策措施甚至管理经验等等，更多强调其有深刻的阶级内容，甚至是反动的和有害的，因而，当时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研究工作，主要是从当时盛行的“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及“资本主义的寄生性、腐朽性、没落性”等理论概念出发，论证其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揭示其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寄生的、腐朽的本质，阐述其固有矛盾的尖锐、经济危机的不可避免和正在“一天天烂下去”的“现实”，而对其在发展经济中符合实际的并取得效益的经验，则没有客观的分析，更谈不到借鉴了。十分明显，这在方法论上是一种片面性的表现，实践上也表明，这种片面性影响了我们大踏步地走向世界的步伐。

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的工作重点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并重新强调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这是一个伟大的转折。这一转折也带来了社会科学研究的春天。就世界经济研究来说，对资本主义再认识的问题也被提出来，对日本经济的研究工作开始呈现新的面貌，研究逐渐走向全面和深入。当然，在此期间，主要是初期，曾出现关于日本经济研究局限于物的因素方面，而较少涉足于其文化因素、精神因素方面。也就是说，关于生产力、经济基础方面的研究多，关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方面的研究少；特别是关于其经济管理体制以及“国民性”之类的因素涉足者更少。这可以说是思想解放不够的表现，实际上，也

是一种片面性表现。

应当强调指出，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和西方思潮的影响，在对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研究中，也出现了另一方面的倾向，就是面对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相对稳定发展，特别是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实现，觉得似乎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剥削雇佣劳动者的本质已经改变，资本主义固有矛盾已经消失，甚至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具有更大的优越性。以这种肯定一切的观点为基础，不仅主张全面借鉴，而且借鉴就是一切照搬，抹杀了对社会的阶级分析和对事物的本质分析。这是另一种更值得重视的片面性。

综上所述，研究战后现代资本主义日本经济，必须坚持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反对上述肯定一切和否定一切的两种片面性倾向。

二

诚然，战后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呈现现代资本主义的新形态和新特点。以日本而论，战后变化的新特点，从宏观上看，主要表现在：一方面，技术革新高度发展，经济高速增长，国民收入大幅度增加，生活得到改善，垄断资本及其政府在推行经济增长主义的基础上，也推行所谓“福利国家”政策，人们的阶级关系意识有变化，价值观和生活信条也发生变化；另一方面，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空前发展，垄断资本同国家政权相结合，国家的经济职能加强了，国家干预经济的力量扩大了，等等。通过这些变化，人们可以看到：（1）日本资本主义还没有达到垂死和没落的阶段，而是尚处于相对稳定发展和矛盾相对缓和的时期，和意味着尚有继续发展的余地；垄断资本从其高额利润第一主义出发，能够在一定范围内调整生产关系，使之继续容纳生产力的发展；我们所处的时代还未到达最后“革命的前夜”，而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继续并存、激烈竞争和在竞争中

发展的时代。(2)尽管资本主义在本质上和总体上仍是无政府主义的,但由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政府增强了广泛意义上的经济职能,包括通过政策手段、计划调解手段等,把国民经济的发展引向政府的政策目标。(3)尽管资本主义经济是以民间企业为主导,民间企业之间往往利害冲突,根据企业利益原则互相竞争,甚至在利害冲突中互相倾轧,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政府能够通过经济手段,运用利益原则,动之以“利”,再辅之以行政的和立法的手段,引导经济发展的方向和步调,调动各方面的力量,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发挥作用,此即所谓诱导性特点,如此等等。这些变化表明,战后资本主义已处于一个高级阶段,日本垄断资本以高额利润第一主义为动力,推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一定时期能在一定程度上自行调整,使之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从而继续维持资本主义的生命力。

不难看出,面对战后资本主义发生的这一些明显变化,日本经济呈现的这些新特点,我们的研究工作在方法论上必须有所发展,把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贯彻到底,真正作到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切忌以主观代替客观,不能以政治制度的差异和意识形态的对立代替客观分析。只有这样,才能正确认识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同时也才能正确认识我们自己在现实的两种制度的并存和竞争中面临的形势、地位和任务,正确认识日本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中取得成效的经验,科学地制定我们的对外和对内的发展战略和政策,不致因理论上和认识方法上的失误而导致实践上脱离实际的盲目性。

三

当代世界的客观形势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在并存与竞争中发展,因此,我们的研究工作要对这种形势有一个实事求是的正确认识。

应当指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制度在本质上是对立的，从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说，资本主义终究要被社会主义所代替，这是历史的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这是研究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时必须强调的最基本的一条。与此同时，这种对立在现实中不是绝对的，实际上二者之间存在着深刻的联系。社会主义脱胎于资本主义，它们之间的联系是历史性的，这一点无需赘述。单就现实的发展生产来说，也有其相通的甚至相同的历史规律，那就是，实现全社会的现代化，不断扩大现代化领域，提高现代化水平，并且其结果是都在为逐步走向共产主义新社会创造条件（对资本主义来说，这是一个不自觉的客观过程）。为此，它们都要求有高度的科学技术水平和雄厚的社会物质基础（这是任何社会都必要的），发达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高度的社会化大生产（因而要求经济的计划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随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其经济的“计划调节”日益趋向明显），现代化的管理（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管理有两重性），等等。

战后经过40年的发展，近些年来，在世界范围内有两个因素在发展：第一，新技术革命方兴未艾，这是一个有普遍意义的挑战和机遇。世界上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层次和水平的各国在这一挑战面前，都在充分利用这一机遇，展开着全面的竞争——归根到底当然是社会制度上的你死我活的竞争，而现实上则主要是以发展商品经济为中心，以全力发展科学技术为基础，经济现代化和国际化方面的激烈竞争。第二，改革潮流蓬勃发展。这是一场面向未来的大竞赛。不同社会制度各国都在力争通过深化改革，面向21世纪，增强“综合国力”——包括经济、科技、教育、文化、政治、军事、外交等领域的实力，并为此而激烈竞争。竞争的中心是科技和教育领域。这种情况表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不仅在发展经济上有共同关心的问题，而且有可能在竞争、矛盾和摩擦中在一定范围内妥协、协同甚至互补、合作。

因此，对包括日本在内的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活动及其发展经济的经验，要有一个实事求是的态度。以战后日本为例，在国内实现经济的崛起，成为“经济大国”，其重大意义自不必说，就是其在高速增长的基础上经济走向国际化，垄断资本在高额利润第一主义指导下的国际经济活动的作用，也是不应忽视的。从借鉴和吸收的角度，即或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只要在发展经济上有用于我国的建设事业，也是可以借鉴和吸收的，而不能把阶级分析方法同“吸收性战略”对立起来。何况日本这类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经济方面的某些成功经验，未必都是资本主义独有的、资本主义性质的东西。有些是属于共通规律性的东西，有一定的普遍意义。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是由历史的与现实的，物质的与文化的，经济的与社会的、政治的，国内的与国际的等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这些因素中，既有属于经济发展规律的有普遍性的因素，又有适合日本特殊国情的因素。前者的借鉴意义自不必说，对于后者也要揭示其阶级实质，指出其客观社会作用。

战后日本政府推行了一系列发展经济的战略和政策，诸如：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在应用中消化吸收和改良创新，进而开发“自主技术”的技术战略和政策；把发展教育事业作为发展经济的基本一环，不断扩大教育投资，坚持教育先行的人才开发战略和政策；逐步实现重化学工业化，并使产业结构不断高级化的产业结构战略和政策；采用新技术、新工艺，加强全面质量管理，不断降低生产成本的产业经营合理化战略和政策；从直接统制到间接控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运用经济手段，加强宏观管理，并实现管理手段现代化的经济管理战略和政策；大力发展出口事业，以本国经济实力为杠杆，逐步实行扩大对外开放的对外经济贸易战略和政策；等等，虽然这些战略和政策实质上是以日本垄断资本的经济增长主义或产业主义为基础的，为垄断资本获得高额利润服务的，但它们在实践上成为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政策因

素，表明是有其客观规律性的一面，是值得研究和借鉴的。

四

不言而喻，认识要全面，切忌片面性。

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研究中，既要实事求是地看到其新特点，又不能抽掉对其本质的阶级分析。借鉴既要总结和吸收其正面经验，又要洞察和汲取其反面教训。那种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的经济活动及其经验持否定一切的观点和倾向，当然不是实事求是的，不科学的，过去曾盛行的这种观点目前已经不多了；而那种基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实现了“奇迹”般的高速增长，就对这种经济肯定一切的态度，同样也不是实事求是的，这是当前需要更重视的一种思潮。

应当指出，现代资本主义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上述一系列新特点，及其推行的一系列政策，其本质都是在垄断资本同国家政权相结合的基础上产生和制定的。当前资本主义的相对稳定，矛盾的相对缓和，乃至经济的发展，决不意味着其资本主义本质的改变和其固有矛盾的解消。就日本来说，其作为“经济大国”、“金融大国”，对不发达国家的经济援助政策，当然有其援助的一面，但其实质，也有如西方有识之士指出的，是凯恩斯主义与福利政策的国际版的一面。其以“经济大国”实力为依托，由“经济国际化”、“政治大国化”和“文化国际化”的构想和实践导致的国际关系上的尖锐矛盾和摩擦，就是其资本主义固有的基本矛盾的一个突出表现。

对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些政策，也要从本质上作深层分析。以日本垄断资本及其政府在总体上推行的经济增长主义路线而论，它作为综合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贯穿于日本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并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一方面，经济增长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一切以发展经济为中心，一切服务于经济的

增长，即经济增长中心主义。这种战略思想，推动着社会各个领域和各个阶层，从政策上、管理上和自我实践上共同沿着经济增长这个统一方向协力行动。这就是日本实现经济崛起，成为“经济大国”的基本原因之一。另一方面，经济增长主义又是以垄断资本的高额利润为杠杆，一切都被作为经济增长(GNP增长)的手段，高额利润的附庸，实质上是高额利润第一主义。这种经济增长主义政策又给日本经济的发展带来制约因素，给日本社会带来新的矛盾，走向了反面。众所周知的日本经济高速增长造成的经济社会结构的不平衡，所谓过疏过密问题，公害问题等等，都是垄断资本的经济增长主义的副产品。

再者，就是从政策方面看，这种经济增长主义的指导思想也导致一些政策的狭隘性和局限性，甚至使政策本身走向反面。例如，日本以“教育投资论”为理论基础的教育政策，虽然在扩大教育投资、提高国民素质和人才培养等方面起了推动作用，但“教育投资论”作为一种政策，被置于经济增长主义的基础之上，实质上是把教育纳入了垄断资本高额利润第一主义的轨道，从而在实践上导致了教育领域中见物不见人和拜金主义，使青年丧失社会责任感。科学技术战略也是一样，经济增长主义导致人们在科技研究上的短期行为和商业化，结果必然延缓未来的科技发展进程。经济增长主义在意识形态上对人们的价值观和生活信条的影响也是深刻的。从战前把“忠君爱国”奉为神圣，到战后把忠于公司、“爱社如家”誉为美德，是人们价值观的转折性变化。一切为了企业的发展和个人的收入，成为人们的生活准则。这方面的论述，在本书中有所展开。

综上所述，日本的经济增长主义路线在实践中产生了双重社会效应——正向效应和负向效应。我们的研究工作应通过深层分析，既看到其政策的表面，又看到其里面，既要看到其主观愿望方面，又要看到其客观效果方面，既要看到其效应的主导的一面，又要揭示其被掩盖的一面。只有这样，才能全面地认识其本质，

科学地借鉴其经验。

五

简短的结论是，从事日本经济研究工作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把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贯彻到底。这样，就可看出，第一，战后资本主义世界发生明显变化，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还要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并存和竞争。我们要立足于这种世界经济政治形势，来制定我们的对外对内经济战略乃至全球战略，摒弃急于求成的思想，树立要在较长时期同资本主义作综合国力的竞争的观念。为此，必须实事求是地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和新特征。第二，战后日本资本主义在实现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以发展商品经济为中心，创造了一些取得显著效益的经验，是有借鉴意义的。我们要勇于和善于总结和吸收那些真正符合我国国情的经验，“洋为中用”，摒弃那种唯我独尊的盲目态度。第三，借鉴必须分析。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并不意味着其资本主义本质的改变和固有矛盾的消失，其内外经济政策也不可能摆脱其阶级性质。我们的研究工作决不能因其经济实现高速增长而一叶障目，忽视对其内在矛盾的研究，而应运用矛盾分析方法，实事求是地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进行分析。那种强调其战后发生明显变化而对其肯定一切，妄自菲薄，在借鉴中一切照搬的态度，在方法论上是不科学的，在实践上也是不可取的，有害的。